

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研究述评

袁指挥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天津市 300387)

摘要: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研究有三个角度:外交关系研究,微观文本研究和宏观叙事研究是主要研究取向;外交制度研究,主要在外交联姻、使节制度、条约、情报交流和外交方式等方面;外交策略研究,主要是文本研究与博弈论研究。总体上看,研究的成果有限,原因在于书信翻译的滞后以及外交史对古代近东外交的排斥性。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是外交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填补研究空白以及整体性研究是外交制度研究的走向,文本分析研究会成为外交策略研究的主导路径。

关键词: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条约;使节制度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180-04

自1887年以来,在埃及、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阿卡德语楔形文泥板,到1979年350块泥板书信出土,按照发现地命名法,学界将其称为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以下简称为书信)。与此同时,学界开始翻译、解读书信,挪威亚述学者克努森系统整理、翻译了当时已知的书信,确定了迄今仍在沿用的书信排序法^[1]。随着文字解读的进步,克努森的翻译在某些方面已经显得过时,英国学者莫兰对书信重新进行了翻译和注释^[2]。随着翻译、解读不断取得进展,书信的价值日渐彰显。从书信可以看出,近东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在世界上第一次形成了跨越西亚、北非的地区化政治体系,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国政治时代,这种大国政治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世界政治”^[3]。学界将书信所在的时代称为“阿马尔那时代”(公元前1361年—前1321年)。由于书信主要反映了埃及与近东各大国、附属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因此,学界最早从埃及对外关系的角度进行单线式的研究(另文论述)。但随着外交史研究范围的拓展,学界逐渐意识到书信对于外交史研究的价值。一些学者运用外交学的理论、方法,重新审视近东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突破了以埃及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更加注重大国之间的互动性外交关系。而另外一些学者注重研究近东的外交制度、惯例。

一、外交关系的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有两个趋势,一是从书信出发,采用考据、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深入挖掘书信文本信息基础上,考察近东各国外交状况;二是立足于书信,结合其他材料(如文字材料、考古证据等),宏观上考察近东外交关系的演化及其影响。从研究内容来说,也有两个趋势,其一是对个别国家进行研究;其二是以近东为单位进行整体研究。一般而言,考据研究往往以个别国家的外交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宏观性研究往往着眼于整个近东地区。在采用考据方法对个别国家外交关系的研究方面,以色列学者阿茨的论文《行动中的外交义务:米塔尼档案》是代表作。作者通过对埃及—米坦尼书信的仔细梳理,把阿马尔那时代的埃及与米坦尼的外交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关系升温阶段和关系恶化阶段。升温阶

* 收稿日期:2010-08-30

作者简介:袁指挥(1976-),男,内蒙古包头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古代近东文明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外交研究”(09YJC770060),项目负责人:袁指挥;天津市教委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古代近东外交制度研究”(20082702),项目负责人:袁指挥。

段主要反映在第 17 号到第 25 号这 9 封书信上,表现为两国复交以及两国建立外交联姻关系。而恶化阶段主要反映在第 26 号到第 29 号这 4 封书信上,表现在埃及赠送礼物质量下降以及使节往来的中断等方面^[4]。这篇论文的最大特点是充分挖掘书信内容,以书信来划分外交发展阶段,值得称道。但是,这种仅仅依靠书信而不参考其他方面资料的分析方法,不能全面再现埃及—米坦尼外交状况。

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以上研究的不足,在材料上,突破了固守书信的做法,辅以其他文献、考古资料,以一国为单位进行研究。霍普金斯大学布赖恩教授的论文《埃及对米坦尼的认知》,以书信为主要材料,参照同期埃及本土的文献、考古资料,梳理了米坦尼与埃及外交关系的全部历程,将两国的外交演变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偶然接触、大规模军事冲突到和平的实现、关系进一步发展及联盟的建立、两国关系的退化及米坦尼的灭亡。其中涉及阿马尔那时代的是第三、四个阶段,着重分析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后期埃及和米坦尼关系的衰退和恶化的种种表现,指出在赫梯兴起的背景下,埃及审时度势,逐渐放弃了与米坦尼的联盟^[5]。这篇论文使用材料多样,理清了米坦尼—埃及外交关系的演变脉络。但是,这种仅仅局限于两国双边关系的研究,不能以整个近东外交格局的演变为背景,因此,在研究中就事论事,不能深入地看待问题。除了这些专门性研究外,我国学者郭丹彤在其专著《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中,在参考丰富的原始资料、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阿马尔那时代的埃及与近东大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尤其关注埃及与巴比伦、埃及与米坦尼之间的外交关系^[6]。

随着研究的深入,宏观性研究突破了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界限,变为了以地域为单位的整体性研究。这种以近东为单位、借助多种材料的宏观研究以袁指挥的论文《阿马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与《论阿马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为代表。前者以埃及与巴比伦的外交关系演变为主线,研究了埃及、巴比伦、亚述之间的三角外交关系^[7]。后者以埃及与米坦尼关系演变为主线,研究了埃及、米坦尼、赫梯之间的三角外交关系^[8]。这两篇论文,既注重从书信出发,也注重从宏观上把握各国外交走向,开创了以近东三角外交区域为单位大地域外交研究。

此外,从外交关系扩展和演变方面,有的学者也作了探讨。科亨的论文《伟大的传统:外交在古代世界的扩散》指出外交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千年代的西亚城邦时代,中经巴比伦和波斯时期,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从外交起源、条约格式的连续性、外交实务和外交观念的转变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对阿马尔那时代的大国外交详细阐释,指出后世的亚述和波斯继承了阿马尔那外交^[9]。

二、外交制度的研究

除了在大国外交实务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外,一些学者从外交惯例、制度的角度对大国外交进行了全新的审视。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将目光主要锁定在外交联姻、使节制度以及外交条约三个方面,个别学者对外交中的情报共享、古代外交原则进行了探讨。从研究方法来看,采用了外交学理论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理论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历史主义原则,避免了古史现代化的倾向。

在外交联姻方面,存在两个研究趋势,一个是以一国的外交联姻为主线进行研究,另一个是以近东为单位对外交联姻进行整体研究,前者更注重考证事实,后者更注重寻求外交联姻中的制度性因素。舒尔曼在论文《埃及新王国的外交联姻》中,对阿马尔那时代埃及与西亚大国的外交联姻重笔浓描,认为外交联姻是埃及审时度势的外交手段,国家贫弱时外嫁公主,在国家强大时迎娶公主。特别指出,外交联姻代表了两国君主而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10]。我国学者王海利的论文《古埃及“只娶不嫁”的外交婚姻》梳理了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外交联姻,指出埃及采取“只娶不嫁”的原因在于埃及人的自我优越感、古埃及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埃及霸权主义思想^[11]。迈耶的论文《外交和国际婚姻》,从大国之间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论述了外交联姻在阿马尔那时代外交中的作用,指出近东各国文化价值的差异阻碍了外交联姻顺利进行^[12]。布赖斯在其著述《古代近东大王之间的书信》中,对大国书信中的外交联姻主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论述,认为外交联姻是近东大国的外交手段,一般情况下联姻会密切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也有可能恶化彼此的关系^[13]。

在使节制度方面,主要以近东为单位,对使节进行全方位研究,着重探讨其制度性因素。霍尔默斯在其论文《阿马尔那书信中的使节》中指出,使节是大国之间外交和经济交往的中介,不仅携带书信、运送礼品、解释国王的意图,而且还是大国之间贸易商人^[14]。格林的专著《古代近东信使的地位和信息》,

该书的第 7-43 页讨论了古代近东的信使^[15]。一位学者对此书有如下的评论:虽然对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赫梯和乌伽里特的使节进行了论证,但是由于在材料使用上不够严谨,出现了很多错误^[16]。奥勒写作的论文《古代西亚的信使和大使》,对有关使节的术语、使节的任务、使节的礼遇、使节的谈判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17]。利韦拉尼在《古代近东国际关系》一书中,按照使节的任务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传递消息的人、较高等级的使节、高级使节^[18]。尽管他的这种划分方法是很可取的,但是划分的范围比较宽泛且针对性不强。袁指挥的论文《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使节》,对使节的分类及构成、使节的职业素养、使节的使命、使节的外交权限及外交特权进行了详实的论述^[19]。

学界对近东条约研究中附带性提及阿马尔那时代条约问题。莫兰发表的论文《关于赛费雷石碑中条约术语的一个注释》,提到了书信中的条约术语与赛费雷石碑中条约术语的相似性^[20]。芬山姆在其论文《条约和盟约中的父亲和儿子术语》中,围绕父亲与儿子这一对术语,追溯了其在外交文书和条约中的使用历程,指出父亲与儿子术语在书信中仍然表示一种附属关系^[21]。希伯来大学的学者魏因费尔德的论文《古代近东的盟约术语及其对西方的影响》,从公元前 15 世纪到公元前 13 世纪近东的盟约术语入手,考察了塞姆语(包括阿卡德语、希伯来语)中条约的表述,指出书信中条约术语属于塞姆语条约术语体系。并且考察了古希腊、拉丁语中的条约术语,指出了近东条约术语对西方的条约术语的影响^[22]。

在外交情报方面,科恩的论文《阿马尔那书信中的情报》是代表作。他指出,书信的主题是政治情报,书信中存在明显的情报话语格式,如,我听说某某事,这就表明大国之间在情报上是进行交流的。他的研究成果是我们所能见到在这个方面的惟一的研究成果^[23]。

三、外交策略的研究

一些学者的研究逐渐从外交关系、外交制度层面上升到外交策略层面。其研究特点在于详细考察书信文本,对文本内容进行前后比对,利用一定理论进行分析。

霍普金斯大学的韦斯特布鲁克教授在 2000 年发表的论文《阿马尔那书信中的巴比伦外交》指出,针对埃及国力强大的现实,巴比伦为赢取外交主动而运用了种种外交策略:夸耀富裕来提高国家地位,两国相距遥远以拖欠礼物,触犯埃及婚姻禁忌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等等^[24]。他对巴比伦外交策略的分析,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德吕克曼与居内尔的论文《阿马尔那外交的一项社会心理学分析》^[25]、《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识别公主:一个阿马尔那故事》^[26]运用博弈论来分析外交策略,前者更为通俗,更多采用了语言描述,后者更为专业,使用了复杂的数学计算公式。文章以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与巴比伦国王卡迭什曼恩利勒的外交交锋为个案进行分析。在外交交锋中,卡迭什曼恩利勒有两种做法,一是应埃及要求派遣贵族,二是不派遣贵族。而阿蒙霍特普三世也面临两个选择,出示公主或者不出示公主。双方都会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埃及的选择的顺序正好与巴比伦的选择顺序相反,最后结果得出了埃及最有利的选择是让巴比伦贵族看望公主,而巴比伦最有利的选择是不派遣贵族,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平衡(纳什均衡)。

四、研究的优缺点及趋势

在外交关系研究方面,学界各家的不同,主要在于研究对象以及考证手段上。小切口、重文本的研究,能够最大程度上挖掘书信所提供的信息,从而使得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但不足之处在于材料单一。小切口、多资料的研究,能够把问题放在更多的材料维度中进行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这两类研究共同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视野狭窄,不能从近东外交体系的宏观层面进行综合考察,其研究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切口、多材料的研究,立足于书信,结合文献、考古资料,以近东为单位宏观考察各国外交概况。在未来的研究中,固然需要小切口微观、大切口宏观研究,但更需要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

外交制度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联姻、使节制度、条约方面、外交情报。外交联姻、使节制度研究最为充分,成果丰富,情报研究只有一篇学术论文,条约方面的研究至今没有直接研究成果。这些单项性研究,研究对象单一,研究范围狭窄,这对于构建外交制度体系的要求来说差距较大。个别学者将礼物交换、外交联姻、情报交流三者进行整体考察,突破单一研究对象的思路,有利于复原外交制度。由于

原始资料的缺乏,对于一些重要的外交惯例或制度,如外交关系建立、中断、复交等程序,境外国民与外交保护,境外犯罪与引渡,学界还不能从制度化的层面进行研究。未来的研究一方面要对尚未涉及的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于原始资料缺乏的某些外交制度,采用文献综合、信息整合的方式进行复原;另一方面以复原外交制度体系为宗旨进行整体性研究。

在外交策略研究方面,学界主要以巴比伦与埃及的外交为个案,借助文本分析以及博弈论进行研究。借助博弈论这种新理论进行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适合运用该理论的书信文本并不多。而文本分析却能够突破这个瓶颈,几乎所有的书信都适合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因此,这种研究思路会成为未来外交策略研究的主导路径。

总体上说,虽然书信已经出土一百多年了,但是,从外交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翻译滞后。书信全部翻译为现代语言(英语)是在1992年,到此时,距离发现书信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因此,翻译的滞后给外交史家接触材料造成了很大困难;二是研究旨趣问题。传统外交史关注近现代外交,即使对古代外交的研究,也多是古希腊、罗马外交,对古代近东外交涉足很少。

参考文献:

- [1] J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M]. Vols. 2, Leipzig: J. C. Hinrichs, 1907-1909.
- [2]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M].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 (德)罗曼·赫尔佐克. 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M]. 赵蓉恒,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2.
- [4] P Artzi. The Diplomatic Service in Action: The Mitanni File[A]. R Cohen,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C].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5-211.
- [5] B M Bryan. The Egyptian Perspective on Mitanni[A]. R Cohen,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C].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71-84.
- [6] 郭丹彤. 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05-111.
- [7] 袁指挥,刘风华. 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4(3):4-8.
- [8] 袁指挥. 论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J]. 安徽史学,2005(5):5-9.
- [9] R Cohen. The Great Tradition: The Spread of Diplomacy in the Ancient World[J]. Diplomacy & Statecraft, 2001, 12(1)-: 32-38.
- [10] A R Schulman. Diplomatic Marriage in the Egyptian New Kingdom[J].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979, 38(3):177-193
- [11] 王海利. 古埃及“只要不嫁”的外交婚姻[J]. 历史研究,2002(6):177-181.
- [12] S A Meier.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A]. R Cohen,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C].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5-173.
- [13] 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14] Y Lynn Holmes. The Messengers of the Amarna Letter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5, (95): 376-381.
- [15] J T Green. The Role of the Messenger and Messag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M].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9.
- [16] S A Meier. Review of The Role of Messenger and Messag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0, (110): 752-753.
- [17] G H Oller. Messengers and Ambassadors in Ancient Western Asia[A]. J M Sasson.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C]. Vol. I & II,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5: 1465-1473.
- [18] M Liveran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M].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19] 袁指挥. 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使节[J]. 历史教学,2008(12):76-79.
- [20] W L Moran. A Note on the Treaty Terminology of the Sefire Stelas[J].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963, 22(3):173-176.
- [21] F C Fensham. Father and Son as Terminology for Treaty and Covenant[A]. H. Goedicke. Near Eastern 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C].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121-135.
- [22] M Weinfeld. Covenant Terminolog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West[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3, (93):190-199.
- [23] R Cohen. Intelligence in the Amarna Letters[A]. R Cohen,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C].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4] R Westbrook. Babylonian Diplomacy in the Amarna Letter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0, 120(3):377-382.
- [25] D Druckman, S Güner.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Amarna Diplomacy[A]. R Cohen, R Westbrook. Amarna Diplomacy [C].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174-188.
- [26] S Güner, D Druckman. Identification of A Princes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 Amarna Story[J]. Theory and Decision, 2000, 48(4):383-407.